

苏颂著述考

许沛藻

苏颂（1020—1101），字子容，庆历进士。经北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历任地方官、馆职和执政。元祐年间，在他主持下，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钟——水运仪象台。同时，苏颂还是一位孜孜以求，学问渊博的学者，尤明于典章故事，于天文历算、山经本草，无所不通。他多次奉诏主持或参预编撰各类官修图籍，内容涉及医药、历史、典制、外交、天文诸领域，他个人还有多种著作，其著述相当丰富，但可惜多已亡佚。据史籍所载，知有十种，兹依撰修时序分述如下。

一、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

全书二十卷，目录一卷。宋元人目录书中多有著录，或称“掌禹锡等补注”，或迳称“掌禹锡撰”，或不著撰人^①。细考是书撰注过程，可知苏颂始终参预其事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约成于东汉，原仅三卷，经梁陶弘景增修为七卷，唐显庆中长孙无忌等奉诏重修，又广为二十卷。后蜀孟昶亦曾命学士“韩保昇与术家各自补辑，辩证者不一。”至宋初开宝年间，又令医工刘翰、道士马志等别加详定，并经学士卢多逊、李昉、扈蒙等刊定，于开宝六年（973）四月由知制诰王祐等奏上，宋太祖亲为之作序，便是开宝《重定神农本草》^②。《开宝本草》本书二十卷、目录一卷。^③。该书曾由朝廷下令“摹印

以颁天下”，广为流传。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八月，韩琦上言：“《神农本草》，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，然其编载尚有所遗，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。”仁宗采纳韩琦建议，下令设立校正医书局，任命直集贤院崇文院检讨掌禹锡、林亿、苏颂、张洞等四人为校正医书官，负责参定。后又差太子中舍陈检、光禄寺丞保衡同校正，并遣医官秦宗古、朱有章祇应^④。嘉祐五年八月补注成书，进奏仁宗。自嘉祐二年至六年三月，苏颂一直担任集贤校理、校正医书官，则他始终参预该书的校定和补注工作，当无疑义。苏颂在《补注神农本草总序》中，考订了《本草经》的撰修过程，细述了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的编修凡例，如果不是总揽全局，则难以做到。正是由于苏颂在撰述《补注》一书过程中的作用突出，在编撰《本草图经》时，掌禹锡建言，奏请由他主持撰述，理由是苏颂“向尝刻意此书”，即苏颂一直刻意于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一书的编注，故而推荐他取代自己负责与《补注》配套的《本草图经》的撰述。

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虽然本于《开宝本草》，但并不是简单地校订，而是依据当时医药学的新成就，对《开宝本草》作了一番拾遗补注的工作。《开宝本草》收有各类药物九百八十三种，而掌禹锡、苏颂等人参校诸家，杂取他书凡十六种，采摭遗逸，新补了八十二种，新定了十七种，刊定新旧药凡一千八十二种。新增内容与旧有内容，“以朱墨书为之别，重加标正，更为补注。”^⑤除新增近百种药物外，还把诸家对各种药物的性味、功用、形状的解释加以辨析，用夹注形式补注于下，因而它不同于通常的校订，而具有著述的性质。

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直到明代《世善堂藏书目》中仍有著录，此后则不见著录，或亡佚于明代。

二、《嘉祐本草图经》

全书二十卷，目录一卷。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，虽对各种药物的性状功用作了文字描述，但难免有疏略不备之处。为了防止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差错，掌禹锡、苏颂等又上疏建议循照唐显庆中旧例，“取诸般药品绘画成图，别撰图经，”“所冀与今《本草经》并行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。”仁宗遂“诏天下郡国图上所产药本”，并“差逐处通判职官专切管勾此事。”搜集药本，绘制图形，是一项规模广泛而又细致的工作，规定“应系产药去处，专令识别人子细辨认根茎、苗叶、花实形色大小，并虫鱼鸟兽、玉石等堪入药用者，逐件画图，并一一开说著花、结实、收集时日及所用功效。”同时注意搜集边疆及海外所产药物，“其蕃夷所产，即令询问榷场、市舶商客，亦依次供析，以凭照证。”^⑥这无疑是一次全国范围的采集药物标本活动，但因各地缴上来的图画和说明，只是一堆原始资料，如不经过统一汇编、整理加工，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经掌禹锡推荐，仁宗诏令苏颂负责此事，俾专撰述。

《本草图经》的编撰工作较之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》更为复杂。一则无现成底本可资参正，唐显庆中诏修本草，虽撰有图经，“辨别诸药，最为详备，”但后来失传，罕有完本。宋初所定《开宝本草》，又未别撰图经。因而《嘉祐本草图经》，基本上是依据各地收集的药物标本图及说明汇编而成的。加之各地所上资料出于众人，体例不一。“天下所上绘事千名，其解说物类，皆据世医之所闻见，事有详略，言多鄙俚。向非专一整比，缘饰以文，则前后不伦，披寻难晓。”^⑦无论从内容的辨析正误，叙事的详略平衡，文字的修润加工，以及体例的统一整齐诸方面，都有大量工作要做。《本草图经》于嘉祐六年（1061）九月由苏颂奏上。

《本草图经》明代亦有著录^⑧，明以降则无考，或亦亡于明代。

三、《两朝国史》

全书一百二十卷。为北宋仁宗、英宗两朝正史。苏颂参预了《两朝国史》的撰修工作。熙宁十年（1077）五月戊午，神宗诏修仁宗、英宗两朝正史，由宰臣吴充提举，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为修史，集贤院学士苏颂任同修史，集贤校理王存、黄履、林希三人并为编修官^⑨。修国史，宰臣监修或提举，一般只是领衔，而修史、同修史则实任其责。元丰三年（1080）九月，改由宰臣王珪监修国史，后又命蒲宗孟为同修史，李清臣、刘奉世、赵彦若、曾肇、蔡卞等人为编修官。元丰五年六月书成，《纪》五卷，《志》四十五卷，《传》七十卷，共一百二十卷^⑩。因后期由王珪监修完成，故多著为王珪等撰。

苏颂未能始终参预《两朝国史》的编修工作，元丰二年初，因故降授秘书监、知濠州，离开了国史院。但他确实参预了《两朝国史》的部分撰修工作，因而当书成行赏时，神宗特赐给银五十两、绢五十匹及对衣金带等物^⑪。

《两朝国史》至迟到元朝至正五年（1345），仍存于世。时脱脱等修《宋史》曾加引用。《宋史·艺文志序》说：“宋旧史，自太祖至宁宗，为书凡四。志艺文者，前后部帙，有亡增损，互有异同。今删其重复，合为一志。”所说四部宋旧史，即包括了《两朝国史》，但此后则亡佚不见。

四、《华戎鲁卫信录》

全书二百二十九卷，事目五卷，总二百册。这是苏颂奉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宋辽关系文献汇编。元丰四年（1081）五月，苏颂自知沧州任上召还，权判吏部，后受命同详定官制，八月因进对

面见神宗，神宗说：“朝廷与契丹通好岁久，故事仪式遗散者多，每使人生事，无以折正。朕欲集国朝以来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，以类编次为书，使后来得以稽据，非卿不可成。然此书浩繁，卿自度几岁可毕？”苏颂表示愿用二年时间完成。遂奉诏编类南北通和以来国信文字。因系对辽关系文件汇编，故书局设在枢密院后厅，又选王汝冀、李士京二人为检讨官^⑫。

神宗下令编撰此书的目的，是要把宋辽关系的全部官方档案，分类编次，以便用作今后处理对辽关系事务的参考，随时稽据。宋辽交往百余年间，国信往还，使臣交聘，礼仪程式，货贿赐予，边界文移，群臣策论，各类档案数量庞杂，仪式众多，因此编撰工作有很大难度。神宗亦自知“此书浩繁”，故委有处理对辽事务经验，又精于典制的苏颂以重任。通过对庞杂的档案进行分类归并，“詮次类例”，“撮其纲目，删彼繁芜。”^⑬又“蒐补阙遗”，杂取宋辽双方文件，凡“有资援据，悉用条陈”。并且对于闻见异辞，各类仪式，发例求端，推原本末，进行辨析考订。于元丰六年（1083）六月完稿，并进呈目录，九月奏上全书。原书名为《编类南北通和以来国信文字》，经神宗赐名为《华戎鲁卫信录》，“曰华戎所以示南北之情通，曰鲁卫所以表亲邻之意厚”^⑭。书成之后，抄送枢密院一部，置柜封锁。

该书因系官府外交档案汇编，未见刊刻流布，已亡佚。考《华戎鲁卫信录总序》，计有：叙事、书诏、誓书、岁币、国信、国书、奉使、驿程地图、（使臣）衔名年表、仪式、赐予、交驰、诏录、书仪、例物、市易（供须求马附）、条例、泛使、交移、河东地界、边防、契丹世系、国俗、官属、关口道路、蕃军马、州县、蕃界杂录（经制方略、论仪奏疏附）等类。可见其分类细密，内容详博，几乎包括宋辽关系中的所有领域，堪称宋辽关系及辽国情资料总汇。它的编撰，不仅为朝廷处理对辽事务提供了便利，而且给当时宋辽关系带来了良好的政治影响。元丰

五年，辽遣使郑顥来贺正旦，苏颂为接辽使馆伴，神宗通过馆伴副使张山甫，把为巩固两朝盟好，正在编修信录之事，告诉了郑顥。郑顥感激称谢，见到苏颂更为恭敬，馈赠礼物异于常时。神宗得知此事，特赐龙茶、琉璃器，由颂作为答礼。郑顥又回赠一端宋宫中所无的异锦相报。从中可以窥见此书对宋辽关系造成良好影响之一斑。

五、《元祐详定编敕令式》

全书五十六卷。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逝世，年幼的哲宗继位，祖母高太后垂帘，起用司马光，北宋政局为之一变。与之相适应，对元丰时期编制的法令，有必要重加修定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三月，根据御史中丞刘摯等人建议，诏令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^⑤。同年十一月，刚迁刑部尚书不久的苏颂，奉诏兼详定重修敕令，典领其事。遂“以元丰敕令格式，并元祐二年十二月终以前海行续降条贯，共六千八百七十六道，兼取嘉祐、熙宁编敕附令敕等”，即以崔台符元丰敕令格式为基础，用此后直到元祐二年终颁布的各项敕令条贯，以及前此所定的嘉祐详定编敕、熙宁详定编敕等条令，相互参照，进行编制。在苏颂主持下，经一年多的修定，于元祐二年十二月成书，名《元祐详定编敕令式》。其中敕二千四百四十条，一十二卷，内有名件多者分为上下，共一十七卷，目录三卷；令一千二十条，二十五卷；式一百二十七条，六卷，令式目录二卷；申明一卷，余条准此例一卷，元丰七年以后赦书德音一卷，总五十六卷，并看详二百卷，共二百四十六册。书成上奏之后，即下诏颁行，并雕印行下^⑥。元祐三年二月，苏颂及参预其事的杜紘、王觐、王彭年、宋湜、祝康、王叔宪、石谔、李世南、钱盖、晁端德、张益、陈兢、刘公璽等十四人，俱推恩被奖，或迁官，或循资，或减磨勘不等^⑦。崇宁元年，政局又变，七月六日，下诏元祐敕令并行毁弃。至南宋初，

诸州法司亦往往无之，故是书已亡佚。

六、《神宗实录》

全书二百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误作三百卷。两宋时期对《神宗实录》几经修撰，此为第一次编修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二月，命宰臣蔡确提举，郑温伯、陆佃并为修撰官，林希、曾肇并为检讨官^⑧。之后数易提举，又多次增加修撰官和检讨官。苏颂于元祐二年正月迁吏部尚书，八月，与苏轼、赵彦若同时被任为实录院修撰^⑨，参预了《神宗实录》的撰修工作。该书于元祐六年三月修成并上进。然于推恩名单中不见苏颂，或以其参预工作不多之故。《神宗实录》后数经改易，朱墨相攻，早已亡佚。

七、《迺英要览》

全书二十卷。迺英阁是皇帝听讲读经史之处。元祐二年，苏颂迁吏部尚书兼侍读，遂上疏称：“国朝典章，大抵沿袭唐旧，史官所记，善恶咸备。乞诏史官学士，采新旧唐史中臣主所行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。”建议编撰汉唐故事，以供年幼的哲宗学习。同年十一月，“诏侍读官遇不开讲日，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，仍旬一录申三省。”^⑩。元祐三年十月，又诏令将诸讲读官所撰汉唐故事，分门编修成册。次年三月，苏颂奏称已编修成册，要求进呈。哲宗“诏以《迺英要览》为名”，六月，由苏颂正式进呈^⑪。

从《迺英要览》一书编撰过程可以看出，它是根据苏颂建议，并在他主持下由各讲读官集体编撰而成的。参与其事的还有讲读官严复、范祖禹、赵彦若、孙免、李常、苏轼、孙固等人^⑫。

《迺英要览》并非简单地抄录史书故事，编撰者往往借鉴历史，加以发挥。苏颂“每进可为规戒、有补时政者，必述以己意，反复言之。”全书分门别类，自成体系，自修身至御戎共六十门。

从提出建议到领衔进呈，起着主导作用，因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录为苏颂编《迺英要览》。

南宋绍兴初，秘书省先后颁有《四库缺书目》及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缺书目》二种，据近人叶德辉所传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缺书目》记载，有《迺英圣览》一十卷，缺。德辉按：“《宋志》史部故事类有苏颂《迺英要览》一部，注云：卷亡。《遂初目》史部本朝故事类亦作《迺英要览》。”意谓《迺英圣览》或即《迺英要览》。然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有《迺英圣览》十卷，丁度编，《宋史·丁度传》亦载：“度有《迺英圣览》十卷。”正与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缺书目》相合。则叶德辉考订有误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称：苏颂《迺英要览》一部，卷亡。可知南渡之后，其书已不存。

八、《浑天仪象铭》

全书一卷。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苏颂奉诏提举试制水运仪象台，先后制成大小木样。四年初，奉准正式用铜制造，至元祐七年初即将完工，四月，哲宗特降诏旨，令苏颂撰写《浑天仪象铭》，以资庆贺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录有：苏颂《浑天仪象铭》一卷。明人已不见著录，或亡于元代。

九、《新仪象法要》

三卷。元祐七年（1092）六月，水运仪象台制成，“诏三省、枢密院官阅之。”^②之后“颂又图其形制，著为成书，上之”。此即《新仪象法要》。现存《新仪象法要》上卷自浑仪至水趺共十七图，中卷自浑象至冬至晓中星图共十七图，下卷自仪象台至浑仪圭表共二十三图，卷末又据别本补入浑象天运轮、铁天轴、天梯、天托四图，全书共有图六十一幅，图后各列文字说明。因此，《新仪象法要》实际是一部水运仪象台制造技术资料汇编。

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著为《绍圣仪象法要》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虽著录有《新仪象法要》一卷，然作者为杨惟德，显系它书。另有《仪象法要》一卷，下注亦云“绍圣中编”，与《遂初堂书目》相合，故《四库提要》认为：“盖其书成于绍圣初也。”

《新仪象法要》成书的确切时间已难考，但据元祐七年六月制成水运仪象台后，苏颂方记其法要、图其形制的过程推断，其成书于绍圣初似可成立。

绍圣初年，政局变化，当时对元祐更化的各项措施多加更张。在元祐中制成的水运仪象台，亦成为非难的对象，《玉海》卷四载：“绍圣中欲毁之，林希为言得不废。”苏颂后人也说：

“祖父元祐中被诏重修浑仪，……绍圣中，日官言其非是，诏近臣覆视，以其法为密，不可改也。”^{②4}经历如此变故，处事练达的苏颂，或有所警觉，为防不测，故“图其形制，著为成书，上之”，以期将其资料留传后世。

又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俱著录为一卷，而今本为上中下三卷，或因当时有不同本子所致。今传本本于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四库所据为清内府藏本，得之于明常熟钱曾所藏影宋钞本。钱曾称：“前列苏颂进仪象状，卷终二行云：乾道壬辰九月九日，吴兴施元之刻本于三衢坐啸斋。此从宋本刻影摹者，图样界画，不爽毫发，凡数月而后成，楮墨精妙绝伦，又不数宋本矣。”^{②5}观钱曾所记，其据宋本影摹无疑，则宋本当为三卷本。又《四库提要》称：“此书卷末天运轮等四图及各条所附‘一本’云云，皆元之据别本补入。”今四库本与此相合，施元之既称“别本”、“一本”，则南宋孝宗年间，确曾有一种以上本子并存，施元之刊刻三卷本时，当曾以别本校勘。此“别本”者或即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之一卷本，惜一卷本久已不传。

十、《苏魏公文集》

今存七十二卷，另《略集》一卷已佚。此为苏颂的诗文集，由其幼子苏耆于颂卒后四十年，收集遗文，编辑成书，时为绍兴九年（1139）。次年正月九日，苏耆病逝^②，据此，则书成之后，未及付梓。

洪迈记有周必大刊印《苏魏公集》一则，云：“今代所传文书，笔吏不谨，至于成行脱漏。予在三馆假庾自直《类文》，先以正本点检，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，予令书库整顿，然后录之。他多类此。周益公以《苏魏公集》付太平州镂板，亦先为勘校。其所作《东山长老语录序》：‘侧定政宗，无用所以为用；因蹄得兔，忘言而后可言。’以上一句不明白，又与下不对，折简来问。予忆《庄子》曰：……始验‘侧定政宗’，当是‘厠足致泉’，正与下文相应，四字皆误也。”^③洪氏所述，似益公所据者亦为抄本，所以有笔吏不谨，抄写讹误之事。周必大撰《苏魏公文集后序》亦称：“……翰林汪公彦章为之序。某尝得善本于丞相曾孙玘，适显谟阁直学士张侯几仲出守当涂，欣慕前哲，欲刻之学宫，布之四方，使来者有所矜式。其用心可谓广矣，故以遗之而纪于后。”时为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十月^④。故太平州镂板者或系《苏魏公集》之初刻本。今本《苏魏公文集》《东山长老语录序》中，正作“厠足致泉”，可证其源于周益公校勘之本。

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为七十二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亦著为七十二卷，另有《略集》一卷。今不见《略集》，《四库提要》认为《略集》已佚，而《文集》仍为完帙。

注：

①《郡斋读书志·后志》卷二、《通志》卷六九《艺文略》、《宋史》卷二〇七《艺文志》。

②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、《玉海》卷六三《嘉祐绍兴校定本草图条》、《通考》卷十八。

③《崇文总目》卷二著为二十一卷；《宋史》卷二〇七著有两部：李昉《开宝本草》二十卷、《目》一卷，卢多逊《详定本草》二十卷、《目录》一卷；《长编》卷一四则仅称二十卷。

④《长编》卷一八六、《郡斋读书志·后志》卷二、《通考》卷一八、《苏魏公文集》卷六五《本草图经序》。

⑤《郡斋读书志·后志》卷二、《玉海》卷六三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一三。

⑥《苏魏公文集》卷六五《本草后序》。

⑦《苏魏公文集》卷六五《本草图经序》。

⑧《世善堂藏书目》卷下。

⑨《长编》卷二八二、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八一《两朝国史》条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四。

⑩《长编》卷三二七、《郡斋读书志·后志》卷一、《玉海》卷四六。

⑪《长编》卷三二七、《苏魏公文集》卷三九《谢修史毕赐银绢对衣金带》。⑫《长编》卷三一五。

⑬《苏魏公文集》卷四四《进华戎鲁卫信录》、卷六六《华戎鲁卫信录总序》。⑭《长编》卷三三九。⑮《长编》卷三七三。

⑯《长编》卷四〇七、《苏魏公文集》卷四四《进元祐编敕》。

⑰《长编》卷四〇八。⑱《长编》卷三六五。⑲《长编》卷四〇四。

⑳《苏魏公文集》卷二〇《请诏儒臣讨论唐朝故事上备圣览》、《长编》卷四〇七。

㉑《长编》卷四二三、《玉海》卷五四。㉒《玉海》卷五四。

㉓《长编》卷四七四。㉔《魏公谭训》卷一。㉕《读书敏求记》卷三。

㉖《浮溪集》卷一七《苏魏公集序》；卷二五《故徽猷阁待制致仕苏公墓志铭》。㉗《容斋四笔》卷二。㉘《文忠集》卷二〇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